

「《新青年》與現代中國『概念變遷』的 多重面向」專題引言

潘光哲*

1936年，與胡適（1891-1962）關係深厚的上海亞東圖書館¹與求益書社重印《新青年》，²當年參與過《新青年》編務的胡適，爲之題辭，撰文聲言：「《新青年》是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劃分一個時代的刊物，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學運動和思想改革，差不多都是從這個刊物出發的。」³胡適強調《新青年》乃是在「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劃分一個時代」，它的帶頭功績在於領導了「文學運動和思想改革」。他的高度評價，看似「老王賣瓜，自賣自誇」；仔細琢磨，這番表彰，其實自有理路，別有寓意。當年由胡適主導創生的《努力週報》（1922年5月7日創刊於北京），⁴卻維持不了多久，就在胡適與一般友朋討論

* 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。

¹ 上海亞東圖書館的主人是汪孟鄒，與胡適爲安徽績溪同鄉，胡適的多種著作原先多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，汪、胡兩人之間的關係與交誼，見沈寂：〈胡適與汪孟鄒〉，收於李又寧編：《胡適與他的朋友》（紐約：天外出版社，1990年）第1集，頁345-389。

² 上海亞東圖書館與求益書社這回重印《新青年》，主要是爲了經濟因素，見汪原放：《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192-193。

³ 胡適：〈《新青年》重印題辭〉，收於歐陽哲生編：《胡適文集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第11冊，頁723。

⁴ 潘光哲：〈胡適與《努力週報》的創辦〉，收於李金銓編著：《文人論政：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》（臺北：政大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81-108。

《努力週報》的未來之際，他的設想評估是：

二十五年來，只有三個雜誌可代表三個時代，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。一是《時務報》，一是《新民叢報》，一是《新青年》。而《民報》與《甲寅》還算不上。

《新青年》的使命在於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。這個使命不幸中斷了，直到今日。倘使《新青年》繼續至今，六年不斷的作文學思想革命的事業，影響定然不小了。

我想，我們今後的事業，在於擴充《努力》，使他直接《新青年》三年前未竟的使命，再下二十年不絕的努力，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建築一個可靠的基礎。⁵

即便擴充觀察的視野來評價《新青年》，胡適的視角，還是不脫「文學革命」與「思想革命」的領域。胡適的認識，「一以貫之」。如他於1932年10月29日在北京大學國文系以「陳獨秀與文學革命」發表講演，就表示當1917年「大家辦《新青年》的時候，本有一個理想，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，二十年離開政治，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，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」。⁶及至1950年代，流寓美國的胡適，應邀進行口述歷史。在他的歷史回顧裡，取「文藝復興」為總括性概念（colligatory concepts）⁷來詮解「新文化運動」的意義；同樣陳言《新青年》之要旨為開展「文藝復興」與「文學革命」，只是受到

⁵ 胡適：〈致高一涵、陶知行、張慰慈、沈性仁〉（1923年10月9日），收於季羨林編：《胡適全集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）卷23，頁414-416。

⁶ 胡適：〈陳獨秀與文學革命〉，收於季羨林編：《胡適全集》卷12，頁227。

⁷ W. H. Walsh, "Colligatory Concepts in History," Patrick Gardiner, edited, *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* (Oxford &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4), 127-144; 參考 W. H. Walsh, *Philosophy of History: An Introduction* (New York: Harper & Row, 1967), 59-63.

1919年「五四運動」以降的多番政治干擾，《新青年》最後居然成爲「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」。⁸胡適對《新青年》的期許評論，不無竟爾「壯志未酬」的感慨。

身爲《新青年》的要角，胡適的評價定位，其實與他自己的關懷所向，主張不談政治，不幹政治，在從事政治改革之前，應先致力於文學、思想、社會的改造，⁹始終密契相關；可以說，胡適的視角，帶有深切「去政治化」的意味，只是他的「一家之言」。顯然，取胡適的述說爲北斗經典，進而開展《新青年》的詮解定位事業，不免局於一隅。

畢竟，創生問世於1915年9月的《新青年》，原本刊名是《青年》，它的催生者陳獨秀（1879-1942），願意耗精費神於斯，自有一己獨特的關懷；¹⁰從《青年》演變爲《新青年》的「來龍去脈」，更須充分釐清，才有可能進一步去探討其地位貢獻。¹¹《新青年》作者、編者隊伍的組建，其實最初也和「同鄉」、「同門」、「同道」等等中國傳統社會的凝聚要素，脫離不了關係；¹²乃至於《新青年》發展成爲「時代號角」，「新文化」得以匯成洪波巨浪，更是經歷了一個相當的「運動」過程；¹³《新青年》與它的各種身分的「讀者」，更有

⁸ 胡適著，唐德剛譯注：《胡適口述自傳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192。

⁹ 羅志田指出，其實胡適於1917年自美國返回中國的時候，本來懷抱的是「講學復議政」的念頭，他會聲言不談政治，是調整自己與時代的社會位置的結果，見羅志田：《再造文明的嘗試：胡適傳（1891-1929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183-185。

¹⁰ 有田和夫梳理陳獨秀前此的思想脈絡，強調陳獨秀創辦《青年》的關懷，是從啟蒙民眾而轉以知識青年爲對象，見有田和夫：《近代中国思想史論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98年），頁344-349。

¹¹ 楊琥：〈《新青年》與《甲寅》月刊之歷史淵源——《新青年》創刊史研究之一〉，《北京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02年第6期，頁124-129。

¹² 楊琥：〈同鄉、同門、同事、同道：社會交往與思想交融——《新青年》主要撰稿人的構成與聚合途徑〉，《近代史研究》2009年第1期，頁54-72。

¹³ 王奇生：〈新文化是如何「運動」起來的——以《新青年》爲視點〉，《近

無數的故事；¹⁴ 甚至讓胡適論斷《新青年》如何成爲「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」的具體情況，也深富歷史意蘊。¹⁵ 凡此諸端，應該都是研究《新青年》不可或缺之一頁。可以說，一旦盡可能逼近歷史現場，無論是追索《新青年》的原來本源，抑或清理《新青年》的現實影響，乃至闡釋《新青年》的歷史遺產，都應該將《新青年》「歷史化」，¹⁶ 不宜「弱水三千，單取一瓢飲」，以免「見樹不見林」之憾。

在緬懷追想《新青年》百年祭的此際，如何取《新青年》全帙爲整體，進行文本的細密研究，應可超越前輩研究者的業績所得。正如後來者屢屢徵引陳獨秀發表於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1號（1919年1月）的〈本誌罪案之答辯書〉裡的這段話，從而論斷「民主」與「科學」是《新青年》（乃至「新文化運動」）的基本核心關懷：

……本誌同人本來無罪，只因爲擁護那德英（引者按，應爲：莫）克拉西（Democracg）（引者按，應爲：“Democracy”）和賽因斯（Science）兩位先生，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。要擁護那德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對孔教、禮法、貞節、舊倫理、舊

代史研究》2007年第1期，頁21-40。

¹⁴ 章清：〈五四思想界：中心與邊緣——《新青年》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〉，《近代史研究》2010年第3期（2010年5月），頁54-72。

¹⁵ 1920年9月，陳獨秀推動《新青年》復刊，復刊的第1號（即第8卷第1號），刊登了陳獨秀〈談政治〉，猶如他轉向馬克思主義的象徵性宣言，《新青年》也闢有介紹「俄羅斯研究」專欄，取材依據多爲蘇聯政府駐美國紐約辦事處的機關刊物 *Soviet Russia*；胡適當時曾批評復刊後《新青年》「差不多成了 *Soviet Russia* 的漢譯本」，又說《新青年》轉爲「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」，良有以也。相關論述，見石川禎浩著，袁廣泉譯：《中國共產黨成立史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40-45。

¹⁶ 即如陳平原倡言，研究《新青年》，應該取「思想史、文學史、報刊史三者的互動」之視野，以可「理解其工作程序並詮釋其文化／文學價值」，確有所見；然其認爲，僅將前9卷的《新青年》「作爲五四新文化『經典文獻』」，並對胡適批評復刊後《新青年》「差不多成了 *Soviet Russia* 的漢譯本」一語，提出實在展現「『道不同不相與謀』的意味；可如此明顯的黨派意識，確實有違『同人雜誌』宗旨」之論斷，其間歷史細節，或宜深化。見陳平原：〈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——《新青年》研究（上）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2002年第3期（2002年7月），頁2、8。

政治。要擁護那賽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、舊宗教。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。大家平心細想，本誌除了擁護德、賽兩先生之外，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？若是沒有，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誌，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、賽兩先生，才算是好漢，才算是根本的辦法。¹⁷

然而，正若金觀濤、劉青峰藉助於現代科技的助力，計量分析民主與科學出現在《新青年》的次數，指陳兩者頻度根本不可相提並論，認為「民主」和「科學」這兩個詞在《新青年》似乎同樣重要，其實是「主觀印象的虛妄」。¹⁸ 由此一例，正可想見，研究《新青年》本來歷史的事業，如果可以盡量「去熟悉化」，跳脫「史家的邏輯」，重新理解「事件的邏輯」，¹⁹ 始可嘗試申述「歷史的本來邏輯」。

本期《東亞觀念史集刊》紀念《新青年》百年祭，特闢專號，刊布之諸篇論文，正是願將還諸歷史本身的探索追問。即如陳建守博士候選人的〈想像與真實：《新青年》再現的「啟蒙運動」〉，直搗龍穴，質疑向被詮解為「啟蒙」領航者的《新青年》，究竟如何理解認識「啟蒙」？作者發現，「啟蒙運動」作為“Enlightenment”的通行譯法，尚未出現在《新青年》同人的筆下；不過，歐洲啟蒙運動的相關

¹⁷ 陳獨秀：〈本誌罪案之答辯書〉，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1號，1919年1月15日，頁10-11。

¹⁸ 金觀濤、劉青峰首先指出，《新青年》雜誌中科學一詞出現了1913次，民主只出現了305次，加上「德謨克拉西」（包括「德先生」）則為513次，用以翻譯“democracy”的「民治」194次，「民權」30次，「平民主義」53次，見金觀濤、劉青峰：〈《新青年》民主觀念的演變〉，《（香港）二十一世紀》總第56期（1999年12月），頁29-41；爾後，他們繼承並修正前作，更有精膩計量分析，指陳1920年以前《新青年》對民主之看法差不多皆為正面意義，此後開始出現負面評價，1923年6月之後負面使用的情況（620次）大大多於正面（64次），1924年之後出現在《新青年》的民主，已具有民主專政的意義。見金觀濤、劉青峰：《觀念史研究：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，2008年），頁276-279。

¹⁹ 王汎森：〈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〉，《新史學》第14卷第4期（2003年12月），頁177-194。

概念與關懷已然進入他們的眼簾。《新青年》對於歐洲啟蒙運動的陳述，或在專事介紹法國啟蒙哲士伏爾泰（Voltaire, 1694-1778）、盧梭（Rousseau, 1712-1778）和孟德斯鳩（Montesquieu, 1689-1755）的學說，述說他們的文字與「革新」當時的社會與民智之關係；或是鋪陳啟蒙哲士「以筆代劍」，引發法國大革命。一言蔽之，《新青年》其實對「歐洲啟蒙運動的關注興致缺缺」。趙沈允博士析論《新青年》創辦人陳獨秀的思想歷程，特別是其「愛國」觀念的演變，則採用數位人文的取向，以 R 語言資料統計方式，進行文本探掘。作者以貫穿陳獨秀寫作生涯的六個關鍵字詞：國民、青年、民主、革命、民族和愛國，計算在其著述出現的頻次，自可為這些詞彙在陳獨秀的觀念世界的變化歷史，別創新解，如她認為，陳獨秀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觀點（Social Darwinian perspective）來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階段論，顯然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的影響，再添一例。²⁰《新青年》「轉向」成為中共機關報之後，究竟提供了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，其間要角瞿秋白（1899-1935）的論說，是簡金生博士闡述的對象。作者指陳，在瞿秋白論述的背後，其實「唯物辯證法成為一個隱蔽的神」，提供它的崇信者從日常生活到政治鬥爭的革命策略，指引中國未來的前行方向，號召信眾同心戮力。

歷經時光的汰洗，我們對《新青年》與「新文化運動」的認識，愈趨豐富多樣。然而，轉移視野，變換焦距，「將五四運動去中心化」（decentering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），²¹從更寬廣的層面推動這段歷史的研究事業，都還仰仗史界有心之士「薪火相傳」。《新青年》百年祭已臨，反思「新文化運動」的共同關懷，已在邁向百年的路上

²⁰ 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中國，參考 James Reeve Pusey, *China and Charles Darwin*(Cambridge, MA: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3)；餘例不詳舉。

²¹ 參考 Hung Yok Ip, Tze-ki Hon, Chiu-chun Lee, “The Plurality of Chinese Modernity: A Review of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,” *Modern China*, vol. 29, no. 4(Oct., 2003), 490-509.

起步前行。本期《東亞觀念史集刊》的諸篇論著，如果可以提供有助於反思認知的一方基礎，則吾輩何其幸焉。